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SUNZHONGSHAN YU XINHAIGEMING

沈渭滨著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沈渭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沈渭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5 字数 369,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627—5/K · 386

定价：14.50元

谨以此书悼念

恩师陈旭麓先生

——作者

序 言

杨国强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沈渭滨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后的一部力学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读，获益良多。

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过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人为救亡图改革，由民族主义凝积成一种强烈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饱含着一腔爱国血诚，但在这种观念里，国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会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国家观念本身的浮泛悬空。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其实，当维新变法时潮初起之时，活跃在潮头的人们中间也少有真能深知“国民”本义者。虽说他们手中拿着李鸿章那一代人所没有的民权和民智，但民权民智都是被救亡招来的，目的本在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它们的价值是由国家观念派生出来的。

孙中山也是一个为救亡而图改革者，同样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以民生立义，却又非常明白地表现了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19世纪的仁人志士们眼中和心中都没有的。方《民报》发刊之初，正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党人中行时的年头，但他却预言“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比照后来的历

史，由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嬗递而引发的历史变迁正是20世纪中国的潮流之一。当然，在孙中山作预言的时候，更能够召唤人心的是武装革命。即使是他周围的那个群体里，也很少有人对此热心唱和。真正以社会思潮的形式体现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嬗递的，是十五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立论于改造社会的争鸣。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思想前潮。虽说后来的争鸣并不以民生主义发露的社会观念为源头，但就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代谢而言，孙中山毕竟在同一个问题上显示了最早的自觉和先觉。

自1911年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与辛亥革命连在一起，在八十多年岁月里成为几代人记叙、探究和反复咀嚼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众多著述曾各见风采地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理解和认知。而孙中山也在后人的笔下获得了一种常新的意蕴。与既有的著述相比，后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富有个性化的思考和见解。

历史人物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也只有在时代的衬映之下才会显得清晰。因此，刻画历史人物需要历史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此多有心悟，全书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面地穿织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众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的矛盾、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团伙内部的矛盾。这个过程显出了与历史进化相关的大是大非，也显出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各自身上的长处和短处。孙中山的形象和人格是与他的友朋、同志、论敌相比较而互见的，因此，孙中山的探索、追求、失败、成功，以至其才识情性，喜怒哀乐都见血见肉，形神兼备。

历史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智慧。前者需要审断，后者需要思辨，而审断与思辨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劳动表现出来的。《孙中

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叙事之中别出心裁，在记实的同时往往对成说作者求审断，表现了作者读史之际的认真思索。例如《行其所志》一章描述了从檀香山兴中会到香港兴中会的史事，并勘比两会章程，信而有征地提出了一些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中国同盟会》一章则排比史实，对同盟会的组织结构作细密分析，然后指出：“许多研究者和辛亥革命史论著，在谈到同盟会组织体制时，往往只说成立大会时确定的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并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初确定的‘三权分立’经历着一个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的变化过程。”与此类似的审断之见还有不少，它们都显示了作者执意求真的识力和努力，史事的叙述也因之而带上了鲜活的研究气息。与记实相比，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常常更困难一些。这种困难在于：一方面，深藏于史实内里的因果、意义、联系只有通过解释和说明才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解释和说明是主观的，而深藏于史实内里的东西却是客观的。两者之间的一致不能借助于直观，只能借助于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铺叙史事之中常以可观的篇幅作论，力求发摅义理，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思辨的自觉追求。例如《新世纪的新力量》一章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逐层分析，指出其中的各个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缺乏统一性。《“联络学界，开导华侨”》一章写出了孙中山和留学生之间的历史感应。《两条战线》一章详论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异同，等等。这些内容都已不止乎记实，而是表达了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体验和理解。比之叙事，这一类地方更见作史的个性和苦心。

除了审断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沈渭滨先生治学的严肃谨慎。全书不少地方都不作一点游词地标出了作者目前不能给以回答的问题。把原来留在心里的问题写入章节之中本非撰作此书的必有之义。但问题本身也是研究的一种结果，它们与见解一起放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作者在这个题

目下已经完成的部分和尚未完成的部分。学术总是与问题结缘的，学术又是天下之公器。因此，见解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问题也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

沈渭滨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但以师门叙先后，他又是我众多的师兄之一。他喜欢热闹，也耐得住寂寞。我在他寓所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其中一半写出了往事的叹喟，一半写出了人生的寄托，可谓甘苦皆备。学者各有气象，坎坷惬意都画出了一个人的情性。他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纪念陈旭麓教授，既说明了学生对于老师长久的怀念，也说明了老师留下的感召力长久地存在于人间。当此学问之道日见落寞之际，这种有志“薪尽火传”的精神无论如何总是令人起敬的。

1993年7月22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杨国强
一 立志与求索	1
(一) 萌生反清之志	1
(二) 政治觉醒的时代	12
(三) 立党开会	27
(四) 上书李鸿章	35
二 行其所志	48
(一) 檀香山兴中会	48
(二) 民主革命派诞生	56
(三) 义师先声	64
乙未广州起义的筹备	64
起义的流产及其原因	73
三 流亡革命家	79
(一) 考察欧洲社会	79
(二) 与康梁谈合作救国	87
孙康合作的由来	91
孙康谈判与破裂	96
(三) 筹划惠州发难	107
(四) 与李鸿章谋两广独立	114
(五) 半途而废的惠州起义	123
四 新世纪的新力量	133
(一) 民族工业与资产阶级	133

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133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139
(二)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	145
群体形成的过程	145
群体觉醒的轨迹	160
五 东京掀起革命潮	168
(一) 留学方向东移	168
(二) 留日学生的团体结合	172
(三) 拒俄运动	180
(四) 也逐欧风唱共和	194
六 “联络学界，开导华侨”	209
(一) 把视线转向留学生	209
(二) 兴中会与海外华侨	219
(三) 兴中会根植何土？	242
七 聚集志士，合成大团	250
(一) 留欧学生加盟	250
(二) 革命小团体纷起	259
华兴会	261
科学补习所	264
光复会	265
(三) 在日志士联合	279
八 中国同盟会	290
(一) 组织结构	290
(二) 宗旨与主义	305
(三) 革命方略	318
九 两条战线	324
(一) 论战：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帜	324
论战的由来	324

论战的趋势及其性质	333
(二) 起义:转战粤桂滇城镇	346
屡扑屡起的边疆革命	346
风行一时的暗杀活动	361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372
十 兄弟阅于墙	386
(一) 细故引出“窝里斗”	386
(二) 接踵而至的分裂活动	394
共进会另立“一统”	394
光复会重建“山头”	398
中部总会“独立行动”	405
(三) 总部领导的措置	417
十一 “有志竟成”	421
(一) 武昌首义与上海光复	421
(二) “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	432
(三) “新纪元的曙光”	448
后 记	466

一 立志与求索

(一) 萌生反清之志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漫长历程中杰出的代表者之一。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以来，长期停留在制器练兵和工艺制造的器物层面上，直到19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从批判洋务派“徒袭皮毛”的反思中，迈向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的制度层次，打开了学习西方的新局面。当时，以康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仰慕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期望以君民共治的方式使中国日臻富强；而以孙中山为旗手的革命者，则追求民主共和政体，立志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使中国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两个伟大的政治家差不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改革思潮也演得颇有生气，但历史最终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孙中山作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执著追求者，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人。

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并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思想演化过程。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1885年是他革命思想的起点。1918年撰写革命经历时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①。1923年1月写《中国革命史》一文时又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②

从孙中山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化过程看，他说自己在1885年有了“决覆清廷”的志向并非言过其实，但若说那时已经有了创建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则恐未必。所谓“民国”只可能是汉族人作主之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1885年作为孙中山革命思想萌发的起点，只能标志他开始成了个反清革命论者，还不是个民主革命论者。即使他的反清革命思想中，狭隘的种族主义仍占着主导地位。

孙中山在1885年萌发反满革命的志向决非偶然。这里面有时代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更有他个人思想演化的因素。

从时代的因素看，19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边疆危机日亟，救亡图存开始形成社会思潮的时期。清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和清军的不堪战守，对有识之士是一种深深的刺激。早期改良派人士的救亡更法主张，正逐渐为标格天下已任的士大夫们所理解、接受。问题是这些自觉觉人的思想界的精英们，他们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清王朝弊政的观察和对西方政体的向往时，不可能超越传统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制约束缚，因此，他们对清政府所持的态度，也只能局限在改良补过的立场而不敢越过雷池。

孙中山和他们不同。他是一个长期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情趣已与传统士大夫迥然有别；他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也和与统治层面有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人士不同，具有较大幅度的人格自由和更鲜明的个性。这就使他有可能更敏锐地把握时代的症候和感受社会思潮的冲击。当他身处异域而回过头来观察中国问题时，腐败落后的切肤之痛更为强烈，问题看得更为真切。他自承受中法战败的刺激而萌生决覆清廷的志向是可能也是可信的。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从历史的因素看，传统的反满复汉思想因清王朝的腐败正在民间潜在滋长，由民间秘密结社领导的造反起义从未间断。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是洪门活跃地区之一。1832年香山天地会首领张斗举义，1837年香山天地会支派三合会起事，1843年张斗余部高明远又在香山重起，这些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事；太平天王洪秀全的故乡花县距香山不远；太平军余部在嘉应州的覆灭，这些又是人们茶余酒后议论的热点。孙中山自幼受会党造反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熏染，集中到一点就是反满，这对他确立决覆清廷之志确实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他后来曾说：“予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余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实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已起。”^①

从孙中山的思想演变看，他长期受过西方教育，不满清政府的腐败专制，有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炽烈愿望。这种爱国之情在一次撼动人心的历史事变冲击下，迸发出对现存统治秩序的叛逆情绪，完全符合一个有为青年确定终身志向的常规^②。中法战争作为孙中山从爱国到反清的思想变化的契机，是合情也是合理的。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的幼年时期，即从6岁到12岁（1872—1878）的6年。这一时期中，他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除了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对世界一无所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一是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对贫乏之苦有难忘的体验。他后来直言不讳地自认出身于贫苦的农家，“早知稼穡之艰难”^③。这种儿时得来的感受，导致了他日后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的严重关注。他说：“我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

① [日]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② 在早期的中国革命党人中，类似孙中山那样因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萌生反满志向者，不乏其人，如尤列、杨衢云、陆皓东、程璧光、程奎光等均是。

③ 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页。

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①；二是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传统教学方法多所不满^②。这对他后来接受西方教育时努力探求新知，一生重视读书是一种直接的推动；三是爱听太平遗兵谈论洪杨故事，在儿童嬉戏中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这虽说是童稚式的好奇心理，但说明他自幼就在这种历史氛围下受到熏染，汉族反抗异族统治的种族情绪一度引起过他的共鸣，并在意识潜层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以上三个方面，作为孩提时代的深刻印象保存在成长后的记忆中，原不为奇，因为任何人都曾有这种直感经验重演的情感活动。孙中山后来多次提到它们，完全是一种感情追溯，而不是在制造自小就有革命思想的神话。

第二阶段是檀香山求学时期，即从12岁到17岁(1878—1883)的5年。这是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政治意识萌发的时期。1878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去，可说是他一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③前二句形象地道出了一个农村少年走出闭塞落后的狭小天地，面对浩瀚大海和未来生活的惊喜之情；后二句则是在日后接受西式教育、追求新知时所得的悟性，并不是同一时序上的感受。但到檀香山去，确是他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新式知识分子的重要起点。他是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中接受西方学校教育时间最长、学业训练最系统化的人物之一。

当然，这个生活经历转变的负面，是他从此再也得不到系统正规地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这使他不得不依靠课余补习经史之学，

① [日]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② 由美国人林伯克撰写的孙中山传记中，曾详细记述了孙中山在村塾受读时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不满情绪，参见[美]林伯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第7章《中山和三字经》，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44—47页。

③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

来充实自己对传统学问的认识和了解^①。但坦率地说，他的旧学根底并不深厚，与熟读经史的士大夫们不能相比，并且在他一生中基本上没有这一类的同志和足资信赖的朋友，日后团聚在他周围形成核心和骨干的，大多是新式知识分子。这就使得他长期来被排除在中国社会影响力最深厚的士绅群体之外，很难得到立宪派的同情和理解。除了因政见相左的原因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檀香山读初中的5年，孙中山最初萌发的新思想和新信念，不是政治而是宗教。他所在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校长韦礼士牧师(B.A. Willis)为了使该校的中国学生们皈依上帝，一开始便有计划地安排了宗教教师和圣经课程，规定每个星期日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据说有的中国学生对此提出了异议^②，但孙中山却在不断的宗教灌输中被基督教教义所吸引。如果不是因哥哥孙眉的反对，他将受洗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宗教最容易在精神饥荒的土壤中生根，尤其是对那些涉世未深、思想犹如白纸的青少年，更能产生潜意识的影响。

应该客观地指出，孙中山在1885年以前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很深的。表现之一是在一神教教义的支配下曾多次毁坏过中国人传统供奉的神像。第一次是在檀香山求学期间毁坏了大哥家悬挂的关帝画像，结果遭到了孙眉的强烈不满，因此停止了他的学业，把他遣送回翠亨老家。第二次是由檀香山回到故乡后在乡里参与乡政改革时，他和他的同乡同学陆皓东一起，毁坏了村庙偶像。结果遭到了乡绅们的激烈反对，他父亲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不得不把他

① 孙中山在檀香山就傅西校时，曾在课余加入杜南创办的华侨夜校学习中文；在香港拔萃书室读高中时，又在课外从基督教伦敦布道会长老区凤墀补习经史之学，直至高中毕业。参见吴相湘：《国父的一位汉文教师，杜南》，台北版《近代史事论丛》第3集；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13页。

② 参见[美]史扶邻著、丘政权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送往香港。中西文化在神道观念上的两次尖锐冲突都使孙中山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并不因此稍息对基督教的笃信，终于在1883年年底在香港和陆皓东等接受了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Charles R. Hager)牧师的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表现之二是他曾一度想当传教士。此事发生在1884—1885年间。喜嘉理牧师对此曾有详细记述：原来，孙眉因其加入基督教而十分不满，在1884年11月把孙中山召回檀香山。他只得从正在就读的香港中央书院辍学回到哥哥身边。“既抵檀岛，其兄胁迫禁阻之，又不予一钱，使无以饘粥资，而其竟不改初志也。侨居之中华信徒，廉得其情，乃醵资遣之归国，学习传道科，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史中不少早期的革命党人都加入过基督教。著名的如上述孙中山、陆皓东外，还有陈少白、郑士良、谢纘泰、曹亚伯、刘静庵等等。有的虽未入教，但对基督教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杨衢云常去教堂做礼拜，如黄兴在1903年逗留上海期间曾多次去圣彼得堂守道，以致该堂的中国籍会长吴国光将要对他登册记名^②。至于党人利用宗教掩护革命活动，更屡见不鲜。孙中山自己就曾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无数次地得到过宗教界的朋友和同志的赤诚相助，其中就有与他同时受洗的陆皓东以鲜血和生命来殉他们的共同事业。所以，基督教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个饶有兴味、值得深究的课题。

孙中山在檀香山求学期间的另一个思想热点是政治。从时序上说，他对政治的关注较之对基督教的兴趣稍晚，大约在1881年前

① 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教之经过》所附《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着重号为我所加，见《革命逸史》第2集，第14页。

② [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